

跨界民族文化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共生整合机制——以泸沽湖景区为例

王维艳¹, 林锦屏², 沈 琼¹

(1.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昆明 650092; 2. 云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 昆明 650092)

摘要: 文章运用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 理论并协同共生 (symbiosis) 理论的分析方法, 对跨界民族文化景区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作了界定, 并就其共生关系、共生模式进行了模型建构; 结合泸沽湖景区典型案例, 构建了该类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共生博弈框架。研究表明: “S-S” 理论的协同应用, 对于跨界民族文化景区业已显现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关系问题的剖析与诊断具有较强的分析力和解释力, 可为整合冲突与建立协作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对滇、川两省告别“一湖两治”, 共同申报泸沽湖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核心利益相关者; 共生冲突; 共生整合机制; 跨界民族文化景区; 泸沽湖

文章编号: 1000-0585(2007)04-0673-12

千百年来, 泸沽湖畔十余个多民族聚居村寨一直沉浸在田园牧歌式的宁静氛围之中。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 摩梭人以其母系大家庭文化和阿夏“走婚”习俗的世界唯一“活化石”的垄断地位而掀起了民族文化旅游热潮。然而, 泸沽湖区不是一个单纯的旅游景区, 同时也是当地多个民族生活的社区; 更重要的是原先这些基于土地权益的农牧聚落, 在旅游开发前已具有相对稳定的共生关系, 但旅游开发及其社区自主旅游发展模式, 不仅使这些农牧聚落加速向旅游社区转化, 而且当地基层政府、企业、社区居民等利益主体也在加速分化和重组, 结果湖区传统的共生关系被打破; 加之行政跨界掣肘、文化“寄生”侵蚀、数十倍于当地居民的旅游客流冲击等已日益威胁到社区的稳定和景区的持续发展。2004 年央视《共同关注》栏目对泸沽湖环境问题的曝光、《云南法制报》等媒体对摩梭文化变异的担忧, 充分暴露出泸沽湖旅游开发与管理中存在的种种共生冲突问题。

为此, 本文尝试运用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 也称利益主体) 理论并协同共生 (symbiosis) 理论 (简称“S-S”理论), 针对泸沽湖共生冲突现状, 探讨共生整合机制, 为滇、川两省告别“一湖两治”, 携手共同申报泸沽湖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 为跨界民族文化景区遗产保护、社区和谐文化建设等提供理论依据和措施建议。

1 “S-S”理论及其协同运用价值

1.1 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在旅游领域中的运用

利益相关者理论源自 20 世纪 60 年代公司经济发达的美英等西方国家, 但其思想却渊源于 18 世纪初, 如《牛津辞典》中有“have a stake”一词。然而, 真正给出定义则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如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 或者能够被企业实

收稿日期: 2006-09-10; 修订日期: 2007-05-28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2004 Y749A) 资助

作者简介: 王维艳 (1964), 女, 云南建水人, 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旅游合作与开发研究。

现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Freeman, 1984), 该定义成为 80 年代后期、90 年代初期对利益相关者界定的一个标准范式。90 年代中期以来, 顺应实证研究和应用推广的需要, “多维细分法”(Charkham, 1992; Clarkson, 1994; Wheeler, 1998) 及量化“评分法”(Mitchell, 1997) 在利益相关者界定中逐渐成为了最常用的分析工具, 并使利益相关者理论具有了很强的可操作性^[1]。

20 世纪 90 年代, 对社区及社区居民参与旅游项目、分享旅游收益、分担旅游外部负面性等问题的关注以及旅游地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现实, 使国外旅游研究者率先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旅游领域并运用于旅游规划与管理研究。本世纪以来, 国内旅游领域也开始尝试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方法来解决旅游规划与景区管理方面的问题^[2]。总的来说, 相关研究已显示出以协作或合作为核心理念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具有的旅游应用价值^[3~11]; 但对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格局、协作的组织形式及优化协作的途径等问题, 尚需寻求社会学和管理学中的组织理论、沟通方法、公众参与等来协同分析和解决^[2]。

1.2 共生理论及其在旅游领域中的运用

基于仿生学原理的共生理念同样源自西方。1879 年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 (Anton de Bary) 首次提出“共生”一词, 并将其定义为不同种属生活在一起; 还明确指出寄生也是一种共生。后科勒瑞 (Caullery, 1952) 和刘威斯 (Lewils, 1973) 又分别对共生、寄生、互惠共生作过定义。20 世纪中叶以来共生思想及方法开始渗透到医学、农业、经济管理 etc 社会经济领域, 并已展示了值得深化拓展的前景^[12]。在国内, 袁纯清 (1998) 首次将共生思想引入并创新为社会科学的共生理论。该理论从共生现象的识别开始寻求共生单元之间的关系, 并以两类 8 种共生模式作为判据构成共生系统分析的逻辑结构 (表 1), 从中得出共生的本质内涵, 即共生单元通过协同或合作达成共生利益的帕累托 (Pareto) 改进^[13] 或最优 (即利己不损人或利己利人); 反过来, 共生利益的帕累托改进或最优又成为推动共生单元利益格局优化的基本动力。

表 1 中的 16 种共生状态既是一种理论假设, 又是种种共生模式的现实归纳, 其中从 P₁ 到 P₄、M₁ 到 M₄ 以及 S₁₁ 到 S₄₄ 的演进是生物界和人类社会进化的根本法则, 符合经济学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 而“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 P₄ 和“一体化共生”组织模式 M₄ 是实现共生单元“双赢”和“多赢”的理想模式, 因其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可见, 共生既是一种自然状态, 又是一种可塑状态。

表 1 共生系统的状态 (S)
Tab. 1 Status of symbiotic system (S)

组织模式 M 行为模式 P					共生利益增进
	点共生 M ₁	间歇共生 M ₂	连续共生 M ₃	一体化共生 M ₄	
寄生 P ₁	S ₁₁ (M ₁ , P ₁)	S ₁₂ (M ₂ , P ₁)	S ₁₃ (M ₃ , P ₁)	S ₁₄ (M ₄ , P ₁)	↓
偏利共生 P ₂	S ₂₁ (M ₁ , P ₂)	S ₂₂ (M ₂ , P ₂)	S ₂₃ (M ₃ , P ₂)	S ₂₄ (M ₄ , P ₂)	
非对称互惠共生 P ₃	S ₃₁ (M ₁ , P ₃)	S ₃₂ (M ₂ , P ₃)	S ₃₃ (M ₃ , P ₃)	S ₃₄ (M ₄ , P ₃)	
对称互惠共生 P ₄	S ₄₁ (M ₁ , P ₄)	S ₄₂ (M ₂ , P ₄)	S ₄₃ (M ₃ , P ₄)	S ₄₄ (M ₄ , P ₄)	
共生组织化程度提高, 共进化作用增强 →					

资料来源: 袁纯清. 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有部分改动.

将共生理论应用于区域旅游合作领域，仅见于吴泓等^[14]、刘荣增^[15]及韩芳等^[16]少数几篇文献，且对于共生理论所提供的理论分析范式远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另外，利益相关者之间因其利益兼容（即质参量兼容）可将它们视为一组或若干组共生单元，并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以某种共生状态呈现出来。因此尝试将“S-S”理论协同应用于跨界民族文化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共生关系格局、协同目标及其优化路径等研究方面，既有其必要性，又具备可行性。

2 研究区概述

2.1 景区旅游发展现状及其省际比较

位于云南省宁蒗县与四川省盐源县交界处的泸沽湖景区，旅游开发滇早川晚，然而往日的“东边日出西边雨”状况正在逐渐改观，甚至在景区基础设施以及服务管理等方面四川已不滞后于云南（表2）。

表2 滇、川泸沽湖景区旅游发展现状比较		
Tab 2 Comparis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between Yunnan and Sichuan in Lugu Lake scenic area		
对比项目	云南片区泸沽湖	四川片区泸沽湖
名称	丽江泸沽湖省级旅游区	四川泸沽湖景区
景区范围	面积 179.8 km ² ；人口约 19000 人，其中摩梭约 9000 人（归属纳西族）	面积 314 km ² ；人口 15000 人，其中摩梭 8000 余人（归属蒙古族）
旅游开发	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始于 21 世纪初
景区地位	玉龙雪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组成部分、省级旅游区、省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水利风景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景观特色	独特的摩梭文化风情、秀丽的湖光山色	
管理体制	丽江市泸沽湖省级旅游区管委会（简称旅管委，市政府直属机构）及泸沽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景区的监管、保护与开发工作	凉山州泸沽湖旅游景区管理局（与泸沽湖镇政府合二为一）具体负责，州县共管，以县为主
景区规划	单方面完成了《泸沽湖省级旅游区总体规划》、《泸沽湖流域环境规划报告》、《泸沽湖省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规划》、《泸沽湖风景区综合规划》	单方面完成了《泸沽湖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泸沽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和《泸沽湖镇建设总体规划》的编制
旅游经营模式	社区自主开发、政府深层介入	社区参与、政府介入
主要旅游社区	落水村、里格村、小落水	博树、多舍、木垮
特色景点	落水、里格、小落水摩梭村寨，里务必岛、谢瓦俄岛，格姆女神山索道、永宁土司府、扎美寺、温泉村	三大精品线路：多舍—杨二车纳姆之家；多舍—里九；多舍—洛瓦；草海、布瓦俄岛、安娜俄岛
旅游接待设施	2005 年，景区共有宾馆、饭店和家庭旅社 75 家，客房 1648 间，总床位数 3400 床，其中落水村占总经营户的 85%；二星级酒店摩梭山庄为政府招商引资项目，拟建的银湖岛度假村为高星级酒店（设有总统别墅区）	2005 年博树、多舍、木垮家庭旅社客房共 774 间，床位 1731 床。新建成的三星级假日酒店分客房区、VIP 别墅区、游乐区、会议区等多个功能区，可容纳 200 多人同时入住
旅游人次与收益	2005 年景区共接待游客 47.8 万人次，其中从四川方向进入景区的游客 8 万人次；门票收入 1250 万元（每人 78 元），旅游综合收入 1.5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6.87%、66.66%、18.29%	2005 年景区共接待游客 10.5 万人次，其中从云南方向进入景区的游客约 3 万人次；门票收入 163.8 万元（每人 80 元），旅游总收入 1600 多万元，均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
景区基础设施	弹石—碎石路面；自导式解说牌示尚不成系统	三级路面；自导式解说系统较为健全

资料来源：根据作者实地调查及丽江泸沽湖省级旅游区管理委员会与四川泸沽湖景区管理局提供的资料整理。

2 2 泸沽湖景区各利益主体间的共生冲突格局

文中的“共生冲突”是指景区利益主体基于权力、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别而导致的矛盾、对立现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但最终利益冲突为主要表达方式；既包括隐性状态下的抵触、紧张与竞争，也指公开而直接的行为冲突、暴力对抗等。

2 2 1 滇、川泸沽湖景区双方面的权力分割与竞争冲突 泸沽湖景区现行管理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就在于省、州市、县各级行政区划人为地割裂了这一完整的湖区人地系统（见图 1）。现实运作中由于受行政边界屏障的制约，目前双方除了在环湖公路对接、门票价格持平等方面有所联动外，在景区命名、旅游规划、资源开发、线路设计、景点宣传、市场促销甚至摩梭人的民族归属等领域尚处于各自为政、缺乏合作的“行政区”经济状态（见表 2），致使区域整体的旅游利益格局至多维持纳什（Nash）均衡（即双方都不亏或不损人也不利己）而非帕累托改进。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景区双方都没有把对方境内的特色景点纳入自己的线路产品范畴，人为割裂泸沽湖旅游的整体性，只能使其吸引力大打折扣；另外四川泸沽湖畔纳西村寨及纳西博物馆的开发可谓是这种内闭型旅游经济下盲目竞争、重复建设的产物，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大多数散客很少光顾这里，原因就在于云南丽江纳西文化吸引区对它们的屏蔽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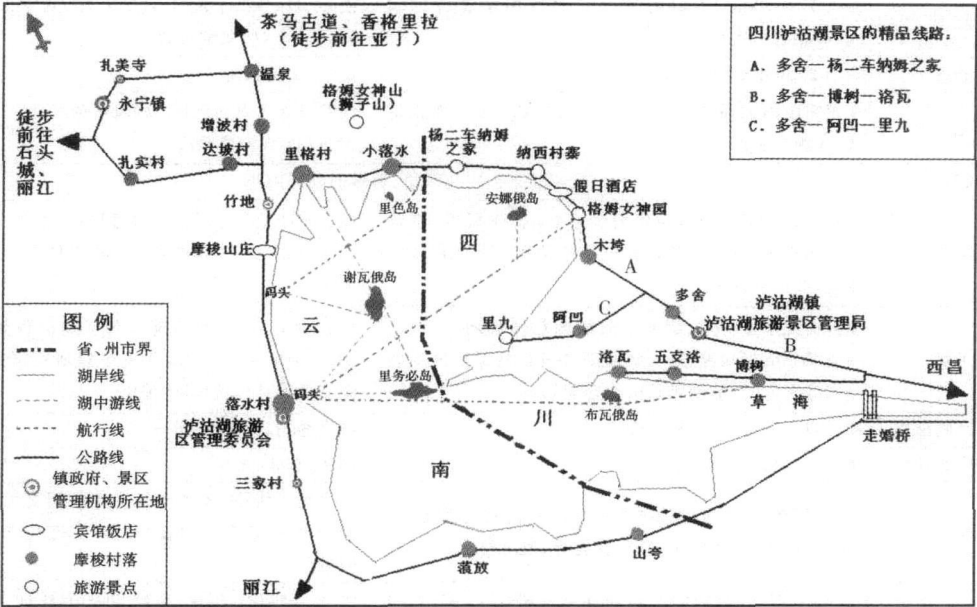


图 1 滇、川泸沽湖景区及其主要景点、旅游社区分布图

Fig 1 A chart of major scenic spots and tourism communities of Lugu Lake area in Yunnan and Sichuan

2 2 2 旅游社区、旅行社与旅游者之间的供需利益矛盾 长期以来，泸沽湖旅游的吃、住、游、娱等旅游产品主要由旅游社区提供，又以落水摩梭社区最为典型，故其问题的暴露也最集中透彻。由于家庭旅馆的经营已呈现出规模化、商业化和现代化趋势，加之游乐产品的开发经营仅限于划船游岛、篝火晚会、骑马、家访等有限的几个项目，因此，访谈

中我们了解到约半数以上的团队游客对落水村提供的旅游产品已颇有微词, 诸如传统摩梭建筑已面目全非, 民族传统服饰已变成年轻人的工作制服; 参与体验项目单调缺乏内涵; 现代餐馆与母屋火塘的隔离, 加上家访活动的不规范使游客缺乏了解摩梭文化的渠道; 旅游服务不够规范等等。而家庭旅社之间的恶性竞争(如“夜宿7元+晚餐7元+早点4元”的民居低廉收费)又进一步加剧了旅游社区与旅游者、旅行社之间的利益矛盾: 旅馆经营户低价竞争收益亏损, 使服务质量下降, 进而引起游客的不满; 游客对旅行社的投诉不断又令旅行社不胜其烦, 甚至昆明等地组团社曾一度不做泸沽湖的旅游线而使其游离于昆明各大旅游组团社线路产品之外, 致使泸沽湖景区的声誉和收益严重受损。

2.2.3 景区管理当局的介绍与社区自主发展之间的权利冲突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围绕巨大的旅游经济利益, 原宁蒗县泸沽湖旅管委与当地社区之间展开了一场无序的开发竞赛, 酿成多起矛盾和冲突。典型事件如1993年景区管理当局在投资兴建摩梭山庄(星级宾馆)的土地出让问题上与落水村村民发生冲突; 1996年摩梭山庄开业后, 景区管理当局直接利用行政手段强行分割市场的行为又使官民关系一度紧张^[17]。

据我们2005年的一次问卷调查得知, 到云南泸沽湖旅游的游客中有72%希望入住摩梭民居, 另外28%希望入住星级宾馆。由于景区管理当局没能及时加以引导、规范和约束, 景区游客行为及其意愿加速了落水旅游社区住宿设施的分化, 依托贷款使现代星级客房不断涌现, 而管理当局试图以星级酒店实现与当地社区摩梭风情民居的协同愿望也就很难达成了。巨额贷款(有的高达200万元)给村民造成了相当大的还贷压力, 而且社区家庭旅社平均向每个游客提供吃、住、游的毛收入大约为100~130元/人·次(景区游客行为特征多数为半天一晚), 而掌控着景区门票权的管理当局, 按游客人数平均的直接旅游门票收益已相当于社区家庭旅社的1/4~1/3(1250万元/40万人≈31元/人·次)。因此, 当地社区有理由要求管理当局在宏观规划、引导协调、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

2.2.4 摩梭文化专营户与其他民族经营户之间的权益冲突 对于以摩梭文化为主要旅游吸引的泸沽湖景区而言, 旅游开发使其直面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击。通过建立健全社区民主化旅游体制和村规民约, 有效制止了传统摩梭大家庭此前为追逐经济利益而造成的分家倾向, 且不分摩梭、普米、汉族户都可均等参与经营集体游乐项目, 从而实现了不同民族户之间的互惠共生与社区的和谐共荣。不过按1996年的73户家屋^①数目加以定格的社区旅游经营体制, 还是损害了少部分人(如当时不愿参加的几个汉族户与后来的分家户, 约14户)的利益, 由于维护这种卡尔多-希克斯(Kaldor-Hicks)利益格局(即大多数人得利且总收益大于少数受损人的损失)需要事后作出相应的利益补偿, 否则冲突将不可避免, 落水村就曾为此付出过血的代价^[17]。

同时, 由于相关的制度安排并未对非摩梭家庭户甚至外来经营者的经营活动作出任何限定, 以致出现了与摩梭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现代酒吧、卡拉OK厅、美容美发厅等经营项目(至1999年出台禁止条例为止); 更有甚者, 个别的外来汉族承租户也公然经营起作为摩梭文化核心的“家访”活动项目, 这让当地摩梭人极为反感。这种文化经营行为在民族文化社区本土应该算作文化越界, 其文化“寄生”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应姑息。种种迹

①家屋是摩梭人生活中的核心概念, 它既指代同一母系家族成员所共居的四合院式建筑, 也指代生活于这个建筑之中的母系家庭。

象说明制度在对人类活动及社会秩序发挥规范和调节作用的同时，因其自身存在着僵化、短缺、非均衡以及制度伦理的滞后性等问题而孕育了制度创新的内生前提^[18]。

3 理论应用及模型建构

3.1 跨界民族文化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及其共生层级模型

针对景区特质对其利益相关者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前提。笔者借鉴目前国内外已尝试运用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最新应用成果^[19~22]，将跨界民族文化景区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界定为这样的一些个人和群体：即他们在景区开发、经营和管理过程中拥有直接的经济、法律和道德利益，享有较大权利，或者旅游景区的发展与决策会对他们本身的利益产生较大影响者，具体包括旅游者、旅游经营商(特指旅行社)、景区产品供应商^①等3大类。再结合共生的一般条件^②，考虑到景区分属不同行政区体系及其“行政区”旅游经济现状，首先将跨界景区双方确认为行政管理层面上的竞合共生单元；再就同一行政区体系内的跨界景区一方的共生单元进一步细分为三层9类(图2)。其中，关注跨界景区双方及其景区产品供应商尤其是当地社区的利益取向是研究的重点及特色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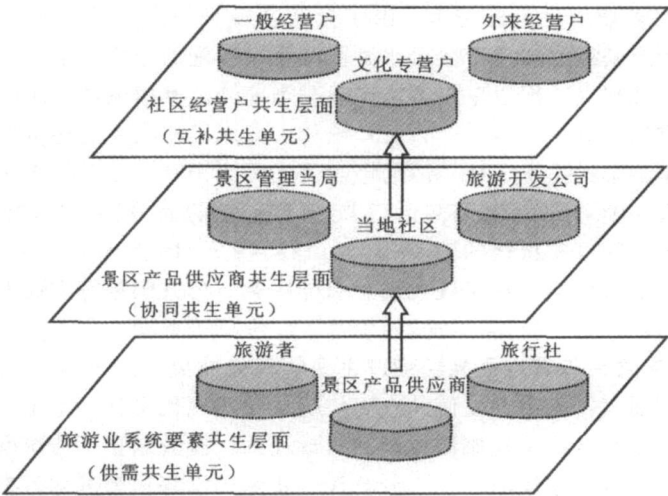


图2 民族文化景区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及其共生层级图示

Fig 2 Key stakeholders and their symbiotic hierarchies in the ethnic cultural scenic spots

3.2 跨界民族文化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共生概念模型

根据共生理论，作为共生单元的跨界民族文化景区双方及其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必以某种共生行为模式呈现出来(表3)。其中， P_1 寄生行为因其“零和”损益结果而不具备长期存在的可能性，而 P_4 已达到帕累托最优，其他模式则属于不同程度的帕累托改进范畴。

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各种共生组织模式(表4)，为共生单元之间寻求优化协作的外部驱动提供了新的路径支撑。

①本文中的“景区产品供应商”是一个包括景区管理当局、宾馆饭店、家庭旅社、商铺与游乐场所经营者、当地社区在内的集合概念。

②共生形成的一般条件包括：共生单元之间必须存在必然的物质、信息或能量联系，即质参量兼容；必须存在某种界面使其具有某种时间和空间上的联系；必须具备与共生单元性质相匹配的单元规模^[12]。

表 3 共生行为模式 (P)

Tab 3 Symbiotic behavior model (P)

共生行为模式	寄生 P ₁	偏利共生 P ₂	非对称互惠共生 P ₃	对称互惠共生 P ₄
内涵特点	假冒伪劣的景点、文化产品经营商与景区同类产品供应商的共生而使后者利益受损的行为	品位相差大的景点、社区、家屋、相关企业间的共生仅限于一方受益的共生行为方式	品位相差较大的景点、社区、家屋、相关企业间的共生呈受益不对等的共生行为方式	品位相差不大、具有较高关联度的景点、社区、家屋及相关企业之间的共生呈对等互利的行为方式

表 4 共生组织模式 (M)

Tab 4 Symbiotic organization model (M)

共生组织模式	点共生 M ₁	间歇共生 M ₂	连续共生 M ₃	一体化共生 M ₄
内涵特点	景点、社区、家屋与其他企业间的共生机会具随机性或一次性共生组织形式	旅游旺季时才被利用的景点、社区、家屋、相关企业间的弹性共生组织形式	常规游路上的景点、社区、家屋、相关企业间的黏性共生组织形式	加入战略联盟或行业协会的景点、社区、家屋、相关企业间的一体化共生组织形式

3.3 跨界民族文化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共生整合驱动分析

文中的“共生整合”主要是针对跨界民族文化景区双方及其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生损益或共生利益非最优化等问题，从功能上和组织上进行整治进而达成互利协作，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复杂动态过程。尽管“协调”、“竞合”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替代“整合”，但是“整合”一词更具有包容性、灵活性和力度，它不仅是被整合者的相互协调，还包括磨合、调控、约束甚至限制^[23]。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对称互惠共生”是共生体进化的最佳状态，但共生整合所要谋求的目标，并非只是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分配的绝对均衡或者“对称互惠共生”行为状态，而是一种多方愿意接受的、利益相对合理分配的互惠共生行为状态，即满足帕累托改进。针对这样的目标而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整合就容易取得大多数利益主体的认可和支持。

就整合的动力因子而言，则主要依靠政府、旅游企业 and 非政府旅游组织三方的协作合力^[24]。具体来讲，就是要借助行政、市场及行业组织的力量，从体制、制度、政策等制度性资源的挖掘与创新入手，依靠法律、规章等正式制度建设实施硬控制，依靠信仰、舆论、宗教、道德等文化因素进行软控制（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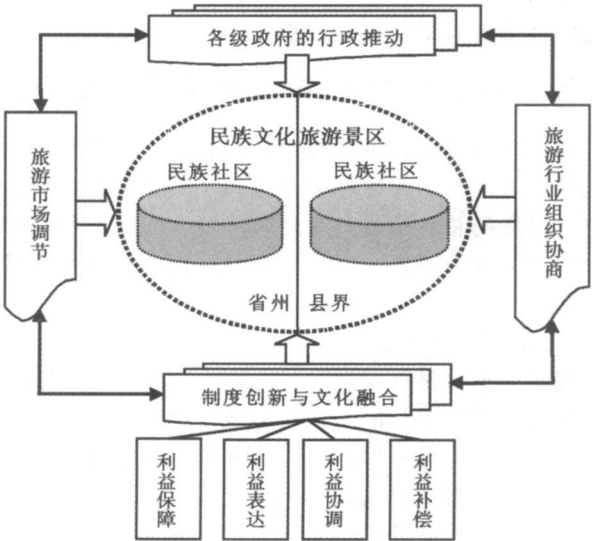


图 3 跨界民族文化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共生整合驱动图示

Fig 3 Dynamic mechanism of symbiotic integration of key stakeholders in the “transboundary” ethnic cultural scenic spots

3.3.1 政府行政推动机制 在区域整体框架下, 尽管跨界景区双方有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 但各自为政的“行政区”经济格局即纳什均衡并非是双方的最佳选择, 基于区域旅游整体利益提升的帕累托改进必将成为推动景区双方走向协同共进的内在动因。另外, 对共享资源实行共享共建, 诸如对水体资源的共同防污、森林资源的共同防护、文化资源品牌的共同建设和维护等也是景区政府双方的共同职责。可见, 政府的有效协同作用主要集中于旅游文化、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共建和制度、政策、法规的制定、执行与监管等领域。为此, 需要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 切实在规划、调控和规范层面上发挥积极作用, 为区域旅游合作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3.3.2 旅游市场调节机制 市场在旅游资源、客源的开发和旅游产品供给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是促进跨界景区双方及其利益主体走向互利合作的重要推动力。具体表现在: 市场竞争和利润最大化的动机, 将驱使旅游企业(如旅行社)突破行政区界限制, 以横向的联合和纵向的兼并, 来整合区域内的生产要素^[24]; 以一体化形式优化利益相关者的组织结构, 最终形成景区各种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

3.3.3 旅游行业组织协商机制 行政或市场的力量均不能解决跨界景区双方及其利益主体旅游发展中所有的矛盾和问题, 而旅游行业协会作为连接两者的桥梁与纽带, 可发挥沟通信息、协调各方利益、规范行业行为等作用。在多数情况下借助旅游行业协会进行磋商与协调往往可以化解矛盾、达成妥协、实现多赢。

3.3.4 地缘文化融合机制 有效地利用地域相邻、人缘相亲、文化相通、交往源远流长等因素, 来推进跨界景区双方及其利益主体的共生演进, 具有潜移默化却不可忽视的影响。事实上, 因地理位置而形成的地缘关系, 因人口流动而形成的人际交往, 因历史传统而形成的相互了解等, 可以减少跨界景区双方旅游协作的阻力, 降低合作成本, 从而使得彼此的合作更易于达成, 也更易于持久^[24]。

4 泸沽湖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共生整合的对策建议

根据共生理论, 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共生整合的上述机制, 需要在良好的共生环境中才能够得以运行。共生环境是指共生关系即共生模式存在发展的外生条件, 共生单元以外的所有因素的总和构成共生环境^[12], 它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就泸沽湖景区而言, 这个系统的功能作用应该着重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发挥。

4.1 强化“一个平台”

现有的平台是已存在了 20 余年之久的由宁蒗县和盐源县联合组建的泸沽湖管理委员会。然而, 该管委会的工作机制及其“点共生”或“间歇式”共生的组织模式, 并未促成双方实质意义上的合作。为顺应新的区域旅游合作形势的需要, 应该考虑设立专属的区域旅游开发组织管理机构, 如国家或省、州市级的更具整合权力的泸沽湖旅游管理委员会。建议由双方政府主管部门领导直接挂职, 通过定期召开协调会, 组织相关利益主体参加, 及时对景区旅游发展与合作交换意见, 商谈合作意向, 为各方达成交易与项目合作牵线搭桥。另外, 通过强化这个平台, 积极推进滇、川双方联合申报泸沽湖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共同目标, 彻底解决泸沽湖“一湖两治”的问题, 对外统一营销口径, 对内统一规划建设、统一组织线路产品、统一经营管理, 以达到“共有、共建、共管、共享”^[25]的协同目标。

4.2 共建“两个协会”

一是泸沽湖景区旅游行业协会。依靠行业自律与市场力量来调节滇、川泸沽湖景区之间、各旅游企业之间的不正当竞争,积极推进各会员如景区产品供应商、旅行社与旅游者之间的供需共生,景区管理当局、旅游开发公司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协同共生,社区民族文化专营户与外来经营户之间的互补共生;通过从功能上、组织上构建旅游企业战略联盟,进而推进共生的一体化进程。同时,利用行业协会在信息沟通、信息公开与利益表达、企业合作等方面的优势,确保相关利益主体的知情权与民主决策权,并使景区利益主体能够在相对透明的信息环境中选择适合自己的协作共生对象。

二是泸沽湖环境保护协会。通过该协会,并协同现行的四川泸沽湖景区环保公司与云南泸沽湖环境整治领导小组工作机制,就滇、川双方有关泸沽湖污水达标排放、废弃物安全处理、泥石流治理与环境美化等方面的信息与技术进行经常性通报和交流,共同协调相关立法、政策、规划及检查监督措施,共同协商、争取国家对于泸沽湖申报世界遗产的政策及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4.3 深化“两个理念”

“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理念。民俗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或一定程度上规范着本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对社会发挥着广泛的教化、维系和调节作用。摩梭传统文化注重整体而非个体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组织形式,使得落水、里格、博树等社区成功实施了社区自主旅游发展模式,其中的民主、互助、包容以及注重母系大家庭整体竞争力等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将有助于大大提高摩梭人及其社区的政治参与和管理能力,并将有利于促进多民族社区的民族融合与社会整合。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理念。泸沽湖景区旅游发展的根基在于其文化资源与生态环境,其核心是摩梭文化及其与母亲湖、女神山等环境因素的耦合。这就意味着泸沽湖旅游必须将资源环境保护与景区建设融为一体,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杜绝诸如“寄生”所带来的文化产品的假冒伪劣问题,对产生大量污水和废弃物的旅游接待设施必须严格限制,坚持走生态旅游和旅游循环经济的路子,这直接关系到遗产保护的有效性和景区的持续发展^[26]。

4.4 建立和完善“四项制度”

依靠政府及行业组织实现相关制度的有效供给与创新,是景区核心利益主体达成互惠共生的重要保障。目前迫切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实施:

(1) 尽快建立民族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如推行外来人口准入制度及经营许可证制度,杜绝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经营中的“寄生”行为,使当地民族文化社区及其文化专营户的文化权益切实得到有效保护。

(2) 构建通畅的利益表达与社会沟通制度、社区听证会制度。借助各种有效形式,如向信访部门上访、投诉,向权力机关递交“准提案”,与政府进行“对话”等方式实现利益表达,使冲突能量得以暂时释放。

(3) 建立健全多种利益协调制度。包括制定并实施行业自律条例(如质量保证金制度、奖惩制度、收入二次分配制度等)、建立游客教育制度、社区听证会制度等。

(4) 要建立利益补偿制度。针对既定政策下利益受损者或景区内的弱势群体,要提供各种形式的补偿,如提供教育引导乃至培训机会,增强他们在旅游相关行业的从业意向与技能,实现利益补偿。

4.5 配套“相关政策”

政府作为规划、调控和规范层面上的行为主体,可通过在旅游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建设以及制度、法律法规等领域出台并实施相关政策,来促成泸沽湖景区各级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共生整合,这是制度安排与创新进程中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

其中,四川泸沽湖景区管理局与各旅行社达成组团协议的奖励政策就值得借鉴。早在2003年泸沽湖景区成立之初,该管理局便和旅行社签订了奖励协议(以门票奖励的形式),不仅把“景区与旅行社合作”作为一种操作方法,而且把它确立为一种共生经营理念,依靠旅行社架构起游客与景区之间的桥梁。由于该管理局对旅行社利益保障的重视,大大调动了旅行社为景区源源不断地输送客源的积极性^[27]。

5 结论与讨论

鉴于目前利益相关者理论尚不能系统地分析和解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格局、协作的组织形式、优化协作机制及路径等问题,故本文在探讨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共生理论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尝试将其运用于跨界民族文化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共生关系的整合研究中。结果表明:“S-S”理论的协同应用,对于跨界民族文化景区业已显现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关系问题的剖析与诊断具有较强的分析力和解释力,并可为整合冲突与建立协作机制提供理论依据,进而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分析范式,即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判定景区核心利益相关群体,再按照共生单元质参量(如利益)兼容的共生条件,将其视为若干层级中的共生单元,判明他们之间的共生关系;然后针对其共生模式中存在的种种损益性共生行为以及不理想的组织形式,结合预设的符合帕累托改进的阶段性利益相对均衡目标(如从 P_1 到 P_4 ,从 M_1 到 M_4),便可对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共生优化提出相应的管理策略或整治方案。当然,共生理论本身在数理分析方法上的尚不成熟将成为今后继续探究的方向性任务。

共生现象既存在于生物界又存在于人类社会,既是自然状态又是可塑状态。共生理论和共生模式不仅应用于自然界,也已借鉴到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和教育学等问题的研究中。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必然产物。正是共生中各方之间的矛盾、冲突、缓解乃至消除,矛盾的再产生、再缓解、再消除……,使得事物在演变进化过程中呈现出竞争对立、寄生依赖、互惠合作等不同共生模式的可塑状态,我们可以从中探寻内在的规律和机制,使对矛盾的对立各方朝协调统一的方向转化,这对于今天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滇、川两省告别“一湖两治”,共同申报泸沽湖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即将纳入双方议事日程以及今后的共生实践进展,泸沽湖的未来将会为这一课题的后续实证研究提供典型案例支撑。

参考文献:

- [1] 贾生华,陈宏辉.利益相关者的界定方法述评.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24(5):13~18
- [2] 周玲.旅游规划与管理中利益相关者研究进展.旅游学刊,2004,(6):53~59
- [3] Fisun Yuksel, Bill Bramwell, Atila Yuksel. Stakeholder interviews and tourism planning at Pamuk kale, Turkey. Tourism Management, 1999, (3): 351~360
- [4] Lindenberg medeiros de Araujo, J Bill Bramwell. Partnership and regional tourism in Brazil.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4): 1138~1164

- [5] 保继刚, 钟新民. 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1~ 2020).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2
- [6] 张伟, 吴必虎. 利益主体理论在区域旅游规划中的应用——以四川省乐山市为例. 旅游学刊, 2002, (4): 63~ 68
- [7] 冯淑华. 三百山旅游发展中流域利益主体关系的探讨. 宜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03, 25(5): 47~ 50
- [8] 周年兴, 俞孔坚, 李迪华. 风景名胜区规划中的相关利益主体分析——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例. 经济地理, 2005, 25(5).
- [9] 江海燕, 曾丽娟, 黄高辉. 森林公园规划中相关利益主体的协调与共赢——以东莞市大屏嶂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为例. 广东园林, 2005, 27(1).
- [10] 李正欢, 郑向敏. 国外旅游研究领域利益相关者的研究综述. 旅游学刊, 2006, (10): 85~ 90
- [11] Tazim B Jamal, Donald Cetz. Collaboration theory and community tourism planning.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5, 22(1): 186~ 204
- [12] 袁纯清. 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1~ 98
- [13] 郑赤建, 苏斌. 基于区域利益论的旅游协作问题研究. 桂林: 社会科学家, 2006, 722(6): 127~ 129
- [14] 吴泓, 顾朝林. 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旅游竞合研究——以淮海经济区为例. 经济地理, 2004, 24(1): 104~ 109
- [15] 刘荣增. 共生理论及其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运用. 工业技术经济. 2006, (25) 3: 19~ 21.
- [16] 韩芳, 帕尔哈提·艾孜木. 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旅游资源整合的动力机制研究——以新疆五地州旅游资源整合为例.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6, (25) 3: 255~ 258
- [17] 落水村旅游体制建立的四个阶段. www. chineseactor. cn
- [18] 李琼. 冲突的构成及其边界——以湖南省S县某事件研究为中心. 上海大学博士论文, 2005
- [19] Freeman R E.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Boston: Pitman Publishing Inc., 1984
- [20] Carroll A B, Buchholtz A K. Business & Society: Ethics and Stakeholder Management. Cincinnati Ohio: Dave Shaut, 1999
- [21] 黄昆. 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景区环境模式研究. 湖北社会科学, 2003, (9): 81~ 82
- [22] 夏赞才. 利益相关者理论及旅行社利益相关者基本图谱.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 32(3): 72~ 77.
- [23] 王士君, 高群, 王丹. 城市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新模式——近域城市整合研究. 地理科学, 2001, 21(6): 62~ 66
- [24] 葛立成, 邹益民, 聂献忠. 中国区域旅游合作问题研究——基于主体、领域和机制的分析. 杭州: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7, (2): 70~ 75
- [25] 告别“一湖两治” 泸沽湖在期待. 四川泸沽湖景区网站. www. sclgh. com.
- [26] 李文华, 闫庆文, 孙业红. 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地理研究, 2006 25(4): 561~ 569.
- [27] 肖薇. 泸沽湖景区管理局重奖旅行社. 凉山日报(汉), 2007-03-06, 第001版.

A study on the symbiotic integrative mechanism of key stakeholders in the transboundary ethnic cultural scenic spot: A case of the scenic spots in Lugu Lake area of Yunnan Province

WANG Wei-yan¹, LIN Jin-ping², SHEN Qiong¹

(1. College of Tourism and Geoscienc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2, China;

2. Institute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Earth scienc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present stakeholder theory cannot systematically analyse and resolve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of patterns of interest,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coordination, and optimize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trajectories of the stakeholders,

this paper, using stakeholder theor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ymbiotic analytical method, defines the key stakeholders in the transboundary ethnic cultural scenic spots and builds models relating to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nd symbiotic models; and, based on the typical case of the Lugu Lake scenic spots, builds a symbiotic game of chess analysis framework in such a kind of scenic spots.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coordinated application of S-S (stakeholder, symbiosis) theory has stronger power of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to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diagnosis of the relationship problems of the key stakeholders already occurred in the scenic spots of tourism so as to provide basi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onflic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moreover, to explore new channels of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Specifically, according to the symbiotic theory, the key stakeholder groups in the scenic spots are defined and, in light of symbiotic conditions of the symbiotic units having quality 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s (e.g. interest), takes it as symbiotic units among the various hierarchies and identifies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mong them; and th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arious types of behaviors spoiling the public interests existing in the symbiotic models and imperfections of the organizational forms, combining predesigned profits relatively equilibrium goal (such as from P_1 to P_4 , M_1 to M_4) matching the improved stage interests of Pareto, it is possible to put forward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improvement schemes corresponding to the optimized symbiosis for the key stakeholders.

In view of the philosophy, contradiction is the internal dynamics and necessary product of objects development. It is just because of the emergence, mitigation and elimination of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as well as their reemergence, remitigation and reelimination in the symbiotic status that makes this process not only keep a reversible state but what is more, makes us find out internal law and mechanism from it. The is of certain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ofou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and harmonious culture and getting rid of the "one lake, two management schemes" of Yunnan and Sichuan provinces as well as bidding for world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Lugu Lake.

Key words: key stakeholder; symbiotic conflict; symbiotic integration; transboundary ethnic cultural scenic spot; Lugu Lake